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 玩 笑

[捷] 米兰·昆德拉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 玩笑

原 著 [捷克]米兰·昆德拉  
翻 译 屈 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I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玩 笑

---

作 者:[捷克]米兰·昆德拉  
译 者:屈 宏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201 千  
印张:10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 作者简介

米兰·昆德拉(1929 — )，捷克作家。

1929 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

1962 年开始创作《玩笑》，1965 年底完稿，出版后风行全国。1975 年流亡法国期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及一些短篇小说，同时还撰有论述小说创作理论的《小说的艺术》。

1973 年，发表《生活在别处》首次获得一项重要的文学大奖法国梅迪西斯奖。

1985 年，他又以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荣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大奖，近年又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其作品从 80 年代末起，大多数被译成中文，在知识界、读书界影响很大，成为新时期最受中国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

## 卢德维克

啊，到了，数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故乡。站在广场上（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曾经无数次地从这里走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激动；我只是感觉，这块平地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阅兵场，高耸在众多屋顶之上的市政厅尖顶，好像是一个古代戴着头盔的士兵；这个摩拉维亚城市曾是抵御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侵略者的堡垒，昔日的战争在它的表面上刻下了一道道不可磨灭的丑陋的伤痕。

多年来再没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我了；我对自己说，在这个地方我没有留下任何感情，这看起来似乎十分自然：从我离开这儿开始，已经过了十五年，我的朋友或熟人大多都已离去（包括那些我想避开的人），我母亲葬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个我从未光顾过的坟墓里。我一直都在欺骗着自己：我以为这是冷漠，实际上却是厌恶；我没有看出这种心理，因为同在别处一样，在这里既有我愉快的经历，也有我不愉快的经历，但仅此而已；正是这次旅行使我意识到：带我来

这里的使命在布拉格也可以轻易地实现，而在这里，在我的家乡，我才突然感到不可抑制地想到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整个念头是这样玩世不恭、卑鄙无耻，以至于我是出自对往事伤感的怀恋而回到这里的任何怀疑都受到了嘲弄。

最后我讥讽地看了一眼外观不雅的广场，转过身去背对着它，动身去找那个我在那儿订了一个房间过夜的旅馆。看门人从木牌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我，说：“二楼。”房间实在是一团糟糕：靠墙有一张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和椅子，床边是一个外观华丽、带有镜子的桃花心木衣柜，门边是一个破旧的小脸盆儿。我把皮包放在桌子上，打开窗户：窗户面朝着一个庭院和邻边楼房光秃肮脏的后背。我关上窗户，拉下窗帘，走到脸盆前，那儿有两个水龙头——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我拧开它们，冷水从两个水龙头里流出来。我看了一下桌子，还不算太差；还可以放一个水瓶，两只杯子；问题是只能坐一个人；只有一把椅子。我把桌子挪到床边，试着坐下去。可是床太低，桌子太高；另外床在承担我的体重时陷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使我顿时意识到，它不但作为一个座位不能使人满意，而且作为一张床也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用拳头撑着床，然后躺下去。并且小心翼翼地抬着腿，以免弄脏了毯子。床陷得很厉害，我简直觉得我是躺在吊床里。真是难以想象还有什么东西能和我一起共享此床。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盯着半透明的窗帘，开始想心事。这时候，从楼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两个人，一男一女，正在谈论。我能听出他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叫皮特的男孩子离家出走了，他的婶娘卡拉娜是个傻瓜，把这孩子惯坏

了。接着一把钥匙在隔壁房间的锁眼里转动，门开了，谈话声仍在继续；我听见那女人在叹气（是的，她的叹气声甚至也能听见！），那个男人决定给卡拉娜一个最后的忠告。

等我站起来时，我已经打定主意；我在脸盆里洗洗手，用毛巾擦干了，然后离开了旅馆，虽然我并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只知道的是，如果我不想破坏这次旅行（漫长而艰辛的旅行）成功的话，除了能得到一个本地熟人的周密帮助外，我没有别的选择，尽管我很讨厌这个想法。我的头脑里掠过了青年时代所有的熟悉面孔，把他们一一都否决了，因为只要由于所提供帮助的机密性质需要我越过这道鸿沟——说明我为何多年在外地我就不愿意做。但是，接着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刚到这儿来的人，这个人我曾经帮他找过工作，如果我真的了解他，他会非常高兴地以德报德的。他是一个古怪的人物，既小心谨慎地严奉道德，又古怪地浮躁不安，反复无常，据我所知，几年前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因为他从来不跟她和她的儿子在一块儿生活。我有点紧张：如果他再婚了，这将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我尽快地朝他所在的方向走去。

当地医院是一个由楼房和分隔部组成的综合建筑群，散布在一大片绿化地区之间，我走进大门旁边的传达室，要门卫帮我拨通病毒室，他把电话往工作台边一推，说：“02。”我拨了02，结果得知卡斯塔医生刚刚离开，到外面去了。我在大门旁边的一张板凳上坐下来，以便不会错过他，一边瞅着穿着蓝白条纹的医院长袍的到处闲逛的人们。接着我看见了他：他思索着走来，又高又瘦，引人注目地没有任何吸

引力。是的，正是卡斯塔，没错。我站起身来，笔直地迎向前去，好像故意要跟他相撞；开始，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接着他就认出了我，随即张开了手臂。我觉着他的欣喜超过了他的惊讶，他那毫不做作的欢迎方式很令人鼓舞。

我跟他解释说我刚来这儿不到一个小时，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要在这儿呆个两三天；他立即对我说，我首先想到来看他，他是如何惊讶和感激。突然，我觉得自己别有用心地，出于算计而不是从真正的兴趣出发而提出我的问题（我快活地问道：“怎么样？又结婚了吧？”）是很不对劲儿的。他告诉我（这使我感到放心）他仍是单身一人。我说我们之间有许多话要谈论。他表示同意，但他抱歉地说他只能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因为他得回医院值班，夜里他还得离开城里。“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住在这儿？”我失望地问道。他让我放心，他说他住在这里，在一个新村他有一个单身房间，但是，他加了一句，“单身生活是没有好处的。”原来卡斯塔有一个未婚妻，住在十五英里外的另一个城镇里，她是一个教师，有一套两个房间的寓所。“那么，你最后将跟她搬到一块儿住？”我问。他说他未必能在那儿找到一个好工作，像我曾帮他找过的那样有意思，而他的未婚妻要在这儿找到一个工作也很困难。我开始（十分真挚地）咒骂官僚主义的失职，不能把夫妇安排在一起住。“冷静点，卢德维克。”他带着温和的宽容说，“其实这样也不太坏。来回旅行虽然花点时间和费用，但是我却保持了我的独处不受影响——还有我的自由。”“你的自由对你就那么重要？”我问他。“那么你的自由对你怎么就那么重要。”他反问道。“我喜欢和女人交

往。”我回答。“我需要自由不是为了女人。”他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喏，到我住的地方去，直到我离开，如何？”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离开医院区不久，我们来到一处建筑物前，楼房鳞次栉比地矗立在一块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场地上（没有草坪、小径或道路），在城市和远处的原野之间形成一道可怜巴巴的屏障。我们走进一道门，爬上一道狭窄的楼梯（电梯出了故障），到了三楼，在那儿我看到了卡斯塔的牌子。当我们从门道里走进主人房间时，我愉快地看见角落里有一张宽大舒适的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安乐椅，一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架，一架唱机和一部收音机。

我称赞了这种设置，并问起了浴室。“一点也不奢华。”卡斯塔说，他对我的兴趣觉得很高兴。他领我回到门道，打开一扇门。这是一间小巧舒适的浴室浴缸、淋浴和脸盆一样都不缺。“看到你这么好的地方，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说，“明天下午和晚上你干什么？”“很不巧，明天我要工作到很晚。”他带着歉意回答道，“我要到七点左右才能回来。你晚上有时间吗？”“或许有，”我答道，“不过你能把这个住处借给我用一个下午吗？”

我的要求使他觉得惊诧，但他立即（好像害怕我会认为他不高兴）回答说，“你能享用它让我感到很高兴。”接着，他谨慎地试图避免猜测我的用心，加了一句，“要是今晚你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不妨留在这里好了。我要到早晨才会回来。不，甚至那时我也不会回来。我会直接去医院。”“不用，没有必要。我在旅馆订了一个房间。麻烦是，旅馆房间

不是很舒服，而明天下午我需要一个舒服的场所。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当然。”卡斯塔说，低下眼睛。“我也这样想。”我顿了一下，然后补充说，“我很高兴能帮助你。”又顿了一下，“提供它的确是一桩好事。”

这以后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卡斯塔倒了咖啡），闲聊了一会儿（我试了试床，满意地发现它很结实，既不凹陷，也不嘎吱作响）很快，卡斯塔说他应该回医院了，他快速地教给我主要的家务事项：浴缸的龙头必须格外拧紧，与经常采用的手续相反，热水只能从标着 C 字母符号的水龙头得到，收音机的插座藏在床下，食橱里有一瓶刚打开的伏特加。他把两把串在一起的钥匙递给我，告诉我开楼房大门的是哪一把，开他寓所门的是哪一把。在我屡屡换床的人生经验中，我已形成一种对钥匙的个人迷信，于是我窃喜地把卡斯塔的钥匙揣进我的口袋。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卡斯塔表示希望他的寓所真的会有助于“一些真正美好的事”。“是的。”我说，“它会帮助我做一桩美好的毁灭工作。”“那么你认为毁灭是美好的。”卡斯塔说。我心中暗笑，他的反应（不动声色地表示异议），使我认出了那个十五余年前初次见到的卡斯塔。虽然我喜欢他，但是我也发现他确实有点可笑，于是我回答说：“我知道在上帝永恒的建筑工地上，你是一个温和的工作者，不喜欢听到任何有关破坏工作的事，但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我的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上帝的泥瓦匠。喏，如果上帝的泥瓦匠修筑了真正的墙，我怀疑我们能否毁坏它们。但我被看到的却不是墙，而是幕布，是布景。而布景是一定能被毁坏的。”

这些话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九年前）我们分手的地方。然而，这一次，我们的争论却带有一种明显的抽象性质，我们对它的具体的基本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觉得用不着再重申它们。我们只需注意到我们改变得是多么少，而我们彼此保留的不同又是多么相似就行了（尽管我必须说，正是我们的不同使我喜欢他，喜欢我们的争论；我把它们作为一个检验我是谁，我在想什么的试金石）。但是为了明确阐明他的立场，他回答说：“就算你说得对，但是告诉我，像一个你这样的怀疑主义者怎么就这么肯定，你知道怎么区分一个布景和一堵墙？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你所嘲笑的幻觉是真正的幻觉吗？万一你错了怎么办？你如此起劲要毁坏的是真正的价值又怎么办？”他接着又说：“一个被贬低的价值和一个没有标记的幻觉有着相同的可怜的外衣。它们是同一的。把其中一个当作另一个是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我陪着卡斯塔穿过城镇回医院去的路上，在口袋里玩弄着钥匙，想到同一个随时随地，甚至此时此刻正在穿过一个新村凹凸不平的路面时，愿意跟我开诚相待的老朋友一起回去是多么愉快。由于卡斯塔知道我们明天晚上还可以呆在一起，所以他把奥妙的哲理探讨转到更为现实的事情上：他想弄明白我到底会不会一直等到他明天七点回来（他没有别的钥匙），并问我是否真的没有别的忙需要他帮助。他用手摸着脸说：“只是要去一次理发店。”因为感到胡子拉碴的不爽快，“把这事交给我。”卡斯塔说：“我要让你享受到第一流的修面。”

我接受了卡斯塔的好意，让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小理发

店，里面有三把大转椅耸立在三面镜子前。其中两把椅子上占着人，头向后仰着，脸上擦满了肥皂；两个穿着白罩衣的女人俯身在他们上面修面。卡斯塔走到一个女人身边，附耳低声说了几句，那女人在一块布上擦擦剃刀，朝店后面叫了几声，又出来一个穿白罩衣的姑娘。新来的姑娘接过那个被丢开手的男人，那个与卡斯塔说话的女人向我点点头，示意我坐到那张空着的椅子上。卡斯塔跟我握握手，走了。他一走我就在椅子上坐下，把头向后靠在头枕上。由于多年的经验教会我不要瞧自己的脸，所以我避开直对着我的镜子，抬起眼睛，让视线游离在污浊斑驳的白色天花板上。

我凝视着天花板，感到那女人的手指把白布单塞到我的衬衫领子里。然后她走了回去，我仅听见剃刀在皮革上上下滑动的声音。我陶醉在一种舒适的懒洋洋中。感觉到她那柔滑的手指在我的脸上涂抹着肥皂，我在想象着这样被一个毫不相识的女人轻柔地抚摸着，而对我却毫无意义，而我也对她毫无意义，这又是多么奇怪和可笑。接着（由于内心甚至在安静时也从不停止恶作剧），我把自己想像成是一个毫无防备的完全任凭那女人用剃刀摆布的受害者。由于我的身躯已在空间溶解，我能感到的只是她的手指在我脸上的触摸，我想像那双温柔的手捧着（转动，抚摸）我的头，仿佛它没有连结着我的身体，仿佛它独立存在，而在旁边桌上伺候着的尖利剃刀只是为了使这种独立存在臻于完美。

然后这抚摸停止了，当我听到那女人走回去，真的拿起剃刀时，我对自己说（因为我的内心还没有停止恶作剧），我必须看看她长得是什么样子，这位我头颅的保管员，我温

柔的暗杀者。我把视线从天花板转移到镜子，顿时一股寒气透过我的脊梁，我的恶作剧已经突然地、可怕地变成了现实：那女人正在镜子里俯向我——我觉得我认识她。

她用一只手按住我的耳垂，轻轻地用另一只手刮掉我脸上的肥皂；当我瞧着她工作时，一分钟前使我莫名其妙的形象开始慢慢溶解和消失。她俯在脸盆上，两只手指沿剃刀滑动抹去肥皂沫，重新直起身子，把椅子轻轻转动了一下；我们的眼光顿时又相遇了，我又一次觉得我认识她。确实，这张脸是有些不一样了，它已变成一张老女人的脸：灰暗，憔悴，微微凹陷；但我已经十五年没有看见她了！在这段时间里，岁月已在她真实的脸上增加了一个面具，但庆幸的是，这面具上面的两个孔把她真正的眼睛，真实的眼睛给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我所认识的眼睛。

然而这影像重又变得混乱了：一个刚来的顾客走进来，坐在我后面傍着轮子；他跟这个女人攀谈起来，谈起这个美好的夏天，谈起他们正在城外修建的游泳池；当她答对时（我注意她的声调胜过注意她说的话，她的话毫无意义），我认为我听不出她的声音；它听起来干巴巴的，魂不守舍，漠不关心，几乎是粗声粗气；这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在她给我洗脸，用双手使劲抚摸我的脸时（虽然她的声音很陌生），我开始再次认为我认识她，十五年后的今天她在这里，重又抚摸我，久久地温柔地抚摸我（我已经完全忘记她是在给我洗脸，而不是在抚摸我）。她跟那位多嘴的顾客唠唠叨叨发出陌生的声音，可是我拒不相信它；我宁愿相信她的手，希望从她的手认出她；我希望能从她触摸的温柔

程度来判断我是不是认识她，她是不是认出了我。

她拿过一条毛巾，把我的脸擦干。那位多嘴的顾客正在为自己的一句玩笑话而大声发笑，我注意到这个女人没有反应。也就是说，她大概没能听见他说的话。这令我感到高兴，我感觉这是她认出了我，而且受到震动的证明。我决定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跟她说些话。她从我脖子上拿掉布罩。我站起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克朗的钞票。我等待着我们的目光相遇，以便我能叫出她的名字（那位顾客还在絮叨着什么），但是她把头转开去，迅速地，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似的接过钱，以至于我忽然感到我是一个被幻觉折磨了的疯子，找不到勇气对她说点什么。

我万分沮丧，离开了理发店。我仅仅知道的是我都不知道，我没有认出一张曾是亲切可爱的脸，这是一个非常冷漠的影像。

我急急忙忙地回到旅馆（在路上我看见过一个老朋友，阿罗斯拉夫，我们民间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但是我躲开了他的目光，就像在逃脱他那响亮、急促的音乐一样），给卡斯塔打电话。他还在医院里。

“那个你让她给我修面的女人，她的名字是不是叫露茜·塞贝塔？”

“她现在用的是另外一名字，但是这正是她。你在什么地方认识她的？”卡斯塔问。

“哦，许多年了。”我回答，竟然也没有想到去吃饭，我又离开了旅馆（天渐渐暗下来），开始在全城闲逛。

## 海伦娜

今天晚上我想早点睡，或许睡不着，但是我还是想早点睡，巴威尔今天下午去了波拉迪斯亚，明天一早我要飞往布尔诺，剩下的路乘公共汽车。小兹德娜将有两天一个人独自度过，她不会在意的，不论怎样她不在乎我们的陪伴，至少是不在意我的陪伴，她对巴威尔特别崇拜，因为他是她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他知道怎样控制她，他知道怎样控制所有女人。过去知道怎样控制我，现在仍是如此，这星期他又像往常一样，抚摸着我的脸，答应我从波拉迪斯五回来途中，在摩拉维亚停留一下，他说我们应该好好谈一下了。他大概是认识到我们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我希望他是想恢复原状，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到现在，既然我已经与卢德维克相遇？噢，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痛苦，但是不，我绝对不会向悲哀屈服，但愿悲哀永远不会玷污我的名字，就像伏契克所说的，他的话是我的座右铭，甚至当他们折磨他，甚至在绞刑架的阴影下，伏契克也从不丧失信心，我才不在乎他现

在合不合潮流，也许我只是一个傻瓜，但是他们就是有时髦的怀疑态度也是傻瓜，我为什么不能用我的愚蠢同他们的愚蠢交换，我不想让我的生活一分为二，我愿意它始终如一，这就是我对卢德维克如此坦率的原因，当我跟他在一起时，我不需要改变我的理想和趣味。他非常正常，坦率、快活，对一切都很明朗，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这也正是我一直所喜欢的。

我并不对我的现状感到羞耻，我只能是我的老样子。直到十八岁时，我所知道的全部生活只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布尔乔亚家族的寓所，还有功课，功课，功课，我差不多脱离了真实的世界，当我一九四九年来到布拉格时，那就好像一个奇迹，我是那样快活，我永远不会忘记它，这就是我绝对不能把巴威尔从我心头抹去的原因，即使我已不再爱他，即使他伤害过我。不，我不能，巴威尔就是我的青春，布拉格，大学，集体宿舍，伏契克歌舞团的大部分人，如今知道它对我们意义的人已经很少了，正是在那儿我与巴威尔相遇，他唱男高音，我唱女低音，我们举办了上百场音乐会和表演，我们唱苏联歌曲，唱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歌曲，当然还有民歌，我们喜欢那些最优秀的民歌，我是那样地爱上了摩拉维亚民歌，它们成我生活的主旋律。

至于我如何爱上巴威尔，我现在绝不能告诉任何人，它仿佛是一篇童话故事。在解放一周年纪念的那天，在旧城广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我们团也在那里，我们一伙到处走动，几万人中的一小群，检阅台上坐着形形色色重要的政治家们，包括捷克的和外国的，传来了各种各样的讲话和

欢呼声，然后陶里亚蒂<sup>①</sup>本人走到麦克风前，以意大利语说了几句话，整个广场像刚才一样以欢呼，鼓掌和口号予以回应，我听见巴威尔在人声喧哗中自顾自地高嚷着什么，似乎有点与众不同，当我盯着他的嘴唇时，我意识到他是在唱歌，更确切地说，是在尖叫着一首歌，他想让我们听见他，加入他，他在唱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它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在当时十分流行：Avanti popolo, a la riscossa, bandiera rossa, bandiera rosa……<sup>②</sup>

这就是十足的巴威尔，他从不满足于个人的感受，他一定要鼓动起人们的情绪。这是多么地美妙，我想，在布拉格的一个广场上，用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向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领袖致敬。我非常希望陶里亚蒂像我一样被感受到，于是我竭尽所能大声地加入了巴威尔的歌声，其他人也加入了我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到最后整个歌舞团都唱起来。可是欢呼声太大，我们仅仅是一小部分，与至少五万人的其他人相比，我们只有五十人，这个差距太悬殊了。我们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因为我们认为，在整首歌曲的第一节我们不会获胜，我们的歌声不会被人听到。然而紧接着一个奇迹发生了，渐渐地，更多的声音开始唱了起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歌声慢慢压倒了广场的人声鼎沸，像一只蝴蝶从一个发出巨大的嗡嗡作响的巨大的蛹里钻出来。最后，蝴蝶，歌声，或至少这最后几小节，飞向了检阅台，我们激动

① 陶里亚蒂（1893—1964）意大利 H 共产党领袖。

② 意大利语：大意是，让我们高举战斗的旗帜前进。